

# “一國兩制”對澳門地方學研究的影響與期待

李燕萍\*

澳門是 16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中期遠東地區最繁盛的貿易中轉口岸，它開啟了廣州貿易體系，也是香港貿易服務業崛起的先導。澳門作為最早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領土在引領歷史先聲中走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受到了學界關注並不斷嘗試着進行理論歸納與總結。20 世紀 80 年代港澳地區地方學興起，很大程度上與 1980 年代對回歸中國後的憂慮有關。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將何去何從，在當時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香港學者李英明適時推出《香港學》一書，分析了香港的發展趨勢。澳門情況亦然，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後，澳門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受到關注。澳門本土學者也認識到，港澳回歸祖國問題已經列入中國的政治議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輪廓也大致顯現。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內地人還是港澳居民，對港澳社會都缺乏學理上系統、全面、客觀的認識，在此背景下，香港學、澳門學的概念應運而生。<sup>1</sup> 澳門地方學在“一國兩制”大背景下迅速得到發展，“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精神，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論支持與學術關注。然而，也有學者清醒地認識到，“澳門學不妨設定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上，它只能是史學研究課題，廣義上，恐怕就是澳門研究的同義詞，儘管在這個概念上尚難以被全面接受。”<sup>2</sup> 客觀地說，“澳門學”稱謂的使用確實需要經過更為縝密的論證說服過程<sup>3</sup>，但是，“一國兩制”作為澳門地方學興起的歷史背景與重要動因卻是不爭的事實，澳門學以史為鑒的研究進路也能為“一國兩制”發展提供更多的協助與論證。因而，有必要認真思考“一國兩制”之於澳門地方學研究的意義，同時將澳門學的研究成果運用於“一國兩制”建設，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成長增添歷史的支持與文化的魅力。如果說澳門學研究就是要從文明的“互動相生”中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明找到可以避免衝突、和諧共處的道路<sup>4</sup>，那麼“一國兩制”就是運用和平與法治的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各種爭端的實踐榜樣，“一國兩制”有理由也有條件成為澳門學的觀察對象與思考範圍。

## 一、“一國兩制”為澳門地方學發展創造良好研究環境

毫無疑問，澳門學蓬勃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施行，“一國兩制”既是保障澳門學發展的基礎性條件，又是澳門學不可忽視的重要研究內容與對象。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建設有序展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為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第一，澳門政治格局保持穩定。回歸以來，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得到尊重和維護，樹立了基本法的權威地位，成為澳門法治社會的憲制基石。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和諧，一方面特區政府和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另一方面中央對澳門的全面管治權能夠得到有效行使。愛國愛澳理念始終是社會主流價值，社會氛圍包容，輿論環境比較良好。澳門社會愛國愛澳政治基礎比較好，澳葡政府治理無效能的客觀現實教育和激發了回歸後主要由華人組成的特區政府的治理熱情與意志，使得愛國愛澳者始終處於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保持了澳門社會的政治穩定與發展。澳門特區政治穩定既是澳門學研究中頗具特色的內容，也為澳門學發展提供了長期穩定的外部政治環境。

第二，澳門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為社會各項工作展開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回歸後澳門經濟進入了歷史上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從1999年到2016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由澳門幣518.72億元增加到2016年澳門幣3,582億元，增長了6.9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從1982年澳門幣2.7萬元躍升至2016年澳門幣55.4萬元。究其原因，《澳門基本法》的制度設計與回歸後中央政府有關政策安排功不可沒。一方面《澳門基本法》確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因而在全國範圍來看形成澳門事實上獨享博彩業專營壟斷的狀態，另一方面內地經濟高速增長、中央開放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推動了澳門博彩業超高速發展，給澳門特區政府帶來巨大財政收入，也為特區政府用各種方式引導社會發展提供了充分財力。就澳門學研究而言，一方面有學者建言“由政府財政撥款，設立澳門學研究基金”，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崔世安也表示，“澳門學有廣泛深入的內容，在其任內政府一定支持推進澳門學。”特區政府還撥款澳門幣6億元編寫、出版澳門地方誌，支持澳門文化事業發展。<sup>5</sup> 澳門學研究的重要人物吳志良也認為“特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吸引了一批優秀專家學者前來澳門，也培養了一批數量不少的本地青年才俊。他們有理論素養、有國際視野，瞭解澳門、熱愛澳門，成為推動澳門學發展的生力軍。”<sup>6</sup> 此外，從2010年開始，在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等澳門學術機構的大力推動下，澳門學國際學術會議已經連續召開四屆，為推廣與深化澳門學研究做出了重要努力，挖掘了澳門豐富的文化內涵，提升澳門的城市品位和國際形象。

第三，澳門社會價值觀與社會文化認同建設進入了歷史快車道，為澳門學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文化自覺意識。所謂社會價值觀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對社會性事項與達成個人及其所屬群體利益之間的利害關係或功能關係的認知。大體上社會價值觀可以分為三種表現形態：制度化形態、知識化形態與生活化形態。<sup>7</sup> 社會價值觀又與社會文化認同表現出相輔相成的關係，尤其是經由官方確認的制度化社會價值觀對社會文化認同起着引導、規範的作用。長期以來，澳門的政治經濟發展總是處於大國政治經濟利益競爭的漩渦之中，回歸之前的四百多年，無論是葡人還是華人，都不能獲得獨立的發展決定權，所以澳門社會從未出現過單一的主導社會意識形態<sup>8</sup>，制度化的社會價值觀也難以持續發展。這與同樣具有外族殖民管治的香港有着極大區別。有一種觀點認為自1970年代以來香港形成了本土意識，“香港人”的含義可以表述為：具有隨心所欲的消費能力、掌握中英雙語能力和擁有民主法治政治理想的中國人。<sup>9</sup> 相比之下，澳門的社會價值觀與“澳門人”社會文化認同的描述顯得模糊不清。回歸後，官方主導的制度化社會價值觀將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共同確定，知識化與生活化的社會價值觀將一如既往在自由原則下運行與發展。然而，對於澳門居民，尤其是澳門特區政府而言，迫切需要通過創建並提出一套新時期的歷史話語來重建澳門社會的凝聚力，以確立與鞏固自己的治理權威。澳門特區政府《200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善良、多元、接納、共融是我們優秀的人文傳統，社會魅力的精華所在，使澳門在祖國、在亞洲保持一種獨特的倫理

溫情。”<sup>10</sup> 這表明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基本政治原則下，澳門的制度化社會價值觀在逐步清晰與穩定發展，澳門人的社會文化心理認同前所未有的明晰起來，這也是回歸後澳門地方學迅速發展起來的重要社會文化動力。

## 二、“一國兩制”應得到澳門地方學研究的關注與支持

第一，澳門地方學需要關注“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政治發展路徑。從政治學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是一個試圖將分歧共融於統一的秩序結構，這也許是個並不容易的理想化的政治實踐過程，然而卻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就澳門而言，“一國兩制”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以行政主導、立法制衡與司法獨立的政治機構建立基本管治秩序，參與社會治理和政治行動的不是政黨，而是擬政治化的各種社團。這一獨特的政治道路與政制特色有着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從學理上確定澳門社團政治的性質、問題與發展前景對於“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政治發展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澳門研究有必要在梳理澳門社團發展歷史的基礎上，結合回歸後澳門社團政治的現實表現，思考澳門社團政治的發展前景，為“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區政治發展實踐提供理論支持。

第二，澳門地方學需要關注“一國兩制”下博彩經濟與澳門經濟多元化議題。早在 2010 年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胡根博士就提出博彩研究是澳門學的重要內容，並指出“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博彩業就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不僅對澳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教育、慈善事業至關重要，對鄰近地區也影響頗深。提起澳門，很多人都會聯想到博彩。可以說，博彩研究是澳門學相當重要的一環。”<sup>11</sup> “一國兩制”條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博彩業既是原有博彩業的延續，又在許多方面發生了質的變化。其一是 1999 年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實施為澳門博彩業繼續生存提供了政治保證；其二是 2001 年賭權開放招標，為澳門博彩業生長打下了制度基礎；其三是 2003 年港澳“自由行”政策的實施為澳門博彩業迅速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市場條件。<sup>12</sup> 因此，對博彩業的思考不能僅僅停留在歷史傳統之中，更應當面對變化了的客觀現實。例如，貴賓廳承包制本身是澳門博彩業機體上自然衍生出一個良性器官，是在適宜的經濟土壤和文化土壤上自然長成的一顆經濟植物，但是面對賭權開放和自由行，貴賓廳承包制的生長環境發生了變化，如何調適澳門博彩業整體與貴賓廳這一器官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不得不關注的問題。<sup>13</sup> 此外，經濟適度多元化是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議題。經濟多元化的方法與路徑等問題都可以從澳門地方學研究中獲得相應的歷史回應，對政府相關決策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三，澳門地方學需要關注“一國兩制”下澳門國家認同問題。現代社會，每個國家都致力於培育國民對於國家的情感認同與精神歸屬感，也就是國家觀念的教育。國家觀念教育是世界各國道德教育普遍包含的內容。通過大量生動具體的歷史教育和儀式教育實現，使學生接受和認同“倫理價值觀、科學概論、美學觀，並理解人們所創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機構的目的和性質”，從而完成國家教育的目標。<sup>14</sup> 一種行為只有在道德上被確認是正當的，才能最終獲得自己的合理性。回歸前，澳葡政府進行殖民管治，澳門人不需要明白國家、民族、主權對自己的意義，客觀上造成了澳門國家觀念教育整體水平比較落後，但是由於各個愛國社團的努力，澳門也積累了較強烈的愛國意識，社團運作方式不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回歸後，特區政府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教育制度，對澳門

社會的公民素養提出了教育總目標，國家觀念教育也逐漸成為公民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使得特區居民的國家觀念培育整體上得到提升。回歸後澳門的國民教育，也有不盡完善之處。例如，葡萄牙人四百多年前立足澳門後，透過澳門為中國的天文、曆法、數學、武器製造、海防、以及難民收容作出不少貢獻，在澳門亦留下法制、天主教、藝術、以及建築等遺產，但沒有任何課程對此作出介紹。澳門與香港不同之處在於澳門對國家的認同一直高於香港。一般人對澳門的歷史發展與成就不甚了了，也沒有清楚的澳門人概念，因此較易接受國家觀念，對國民教育不太抗拒。<sup>15</sup> 為了貫徹愛國愛澳教育，有必要對全澳學校的愛國愛澳教育提供幫助和引導，使其成為澳門全人發展與社會發育的重要基地。事實上，澳門有自己的歷史文化、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環境，編寫體現本地文化的教科書成為人們對優質教育的重要期盼。澳門學可以充分利用史學研究優勢，客觀系統地闡述澳門本地發展史，為澳門社會塑造既有歷史傳承、又符合“一國兩制”發展需求的國家認同意識，明確其內涵，為中國國家觀念發展注入新的理論元素。

### 三、澳門地方學對“一國兩制”發展道路的可能貢獻

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和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門學已經取得的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何將這些研究成果轉化為澳門“一國兩制”發展過程中可以使用的理論認知應該是澳門學研究最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認為現有的澳門學研究成果對特區“一國兩制”發展可能的貢獻主要在於：

第一，澳門地方學研究可以幫助“一國兩制”更好地轉化為制度文化。學界一般從五個方面理解與把握地域文化，即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與心態文化，這是一種廣義的大文化，其內涵與外延比單純的精神文化要豐富的多。觀照澳門文化，也以立足於這種大文化觀為妥。<sup>16</sup> 制度文化是人類為了自身生存、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主動創制出來的有組織的規範體系。主要包括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人才培養選拔制度、法律制度和民間的禮儀俗規等內容。制度文化是人類在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準則等，都是制度文化的反映。“一國兩制”本身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實現當代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立統一，就在於承認資本主義具有可利用性、可改造性、可借鑒性、可駕馭性前提下令其舊為新用、外為中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sup>17</sup> 換言之，“一國兩制”將從“口號化”的基本國策逐步夯實為具有豐富內容的制度安排，以特別行政區制度為核心，包括澳門的中央地方關係、澳門對外交往關係等內容。因而有必要從制度文化層面理解與認識“一國兩制”，促使“一國兩制”落地生根，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不可動搖的根基。澳門學研究中揭示出來的澳門文明“互動相生”現象可以為促進“一國兩制”制度文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持，不是在征服中求勝利，而是在多元中求和諧；不是在衝突中被毀滅，而是從多元中求大同。<sup>18</sup>

第二，澳門地方學研究可以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提供註腳。“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既是因應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需求而進行的理論歸納，也是相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而提出。2009年時任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的楊允中就提出了思考“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的課題。他指出“澳門是繼香港之後第二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總體觀察，澳門特別行政區所走過的路是一條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之路，因而，理所當然地，它應該，事

實上也已成為一個正確落實‘一國兩制’的生動範例，而探索‘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或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應該說已經提到歷史日程，既有理論的必要性又有現實的可行性。”<sup>19</sup> “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脫離不開澳門獨特發展歷程及其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沒有這種歷史的鋪陳，很難想像“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能夠橫空出世。因此，澳門學研究的諸多方面都可以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提供很好的養分，促使其健康發展。例如，談論澳門的中央地方關係，不僅可以觀察澳門與明清朝廷、國民政府以及新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沿革，還可以觀察澳葡政府與葡萄牙關係的發展變遷，這對於思考澳門特區的中央地方關係都具有借鑒意義。又如，根據澳門社會包容和諧特性總結出異質文化互動相生的澳門學研究範式即有助於理解澳門社會內部結構的自然演進過程，更可以在認識與優化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結構時發揮作用。

第三，澳門地方學研究是澳門“一國兩制”持續發展的助推力。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澳門模式”受到了世界廣泛關注和高度讚賞。然而，“一國兩制”並非一蹴而就的課題，需要在漫長時光流逝中經受考驗。事實上，正如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視察澳門時指出，未來幾年港澳將進入一個諸多矛盾疊加、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應當看到，隨着“一國兩制”實踐的推進，社會轉型過程中矛盾錯綜複雜，加上外部勢力的干預滲透，澳門特區也面臨不少困難與挑戰。換言之，“一國兩制”長期穩定發展才是澳門特區的根本保障。澳門學研究全方位的展開對於促進與推動澳門“一國兩制”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有學者觀察到“從學科特徵上看，澳門學不僅僅是歷史學，而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澳門歷史發展以及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澳門的歷史、文獻、政治、經濟、社會、語言、人種、地理、宗教、民俗、建築等諸多領域。”<sup>20</sup> 澳門學研究表明澳門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在容忍、承認、尊重基礎上產生的信任、合作、互助、共同承擔和社會責任感<sup>21</sup>，完全可以成為澳門“一國兩制”未來發展過程中克服困難、精誠團結、再創輝煌的出發點。

在世界範圍內，以一個個具體城市所在的地理區域為研究對象，對諸如城市規劃學、建築學、歷史學、地理學、經濟學等具體學科進行整合的城市地方學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旨在探索、發掘某個具體城市的特質和個性，從而很好地拓展城市研究的深度。<sup>22</sup> 作為城市地方學的澳門學不僅有着豐富的文獻資料為支撐，更有着“一國兩制”的無限前景為激勵，澳門學應當更加積極地關注澳門“一國兩制”發展狀態，為“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輸送更加豐美的養料，使其落地生根，發展壯大。正如吳志良所言，“如果我們當時有足夠的遠見順勢去建構港澳地區本土的知識體系，那麼港澳回歸之路可能會更加平坦，港澳特區的創建也可以少一點曲折。”“對本土知識的充分瞭解，能夠協助我們確切認識從哪兒來、在哪裏、往何處去這些關鍵性問題，從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可以更加清晰地認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高度，可以更加清楚當家作主的內涵。”<sup>23</sup> 可見，澳門學既是歷史的，更是時代的，不僅為特區發展提供知識支持和理論支撐，也為人類文明樹立一個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典範，澳門所經歷的中葡關係歷史，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sup>24</sup>

註釋：

- <sup>1</sup> 吳志良：《作為本土知識體系而構建的澳門學》，載於郝兩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7頁。
- <sup>2</sup> 楊允中：《整合學術，確保長期繁榮穩定》，載於郝兩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4頁。
- <sup>3</sup> 在本文中澳門學與澳門地方學基本同義。
- <sup>4</sup> 郝兩凡：《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載於郝兩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4頁。
- <sup>5</sup> 陳樹榮：《再議建設澳門學》，載於郝兩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3-54頁。
- <sup>6</sup> 武勇：《澳門學研究的四大挑戰——訪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7月29日。
- <sup>7</sup> 王處輝：《論澳門回歸後之社會價值觀格局的重建》，載於李向玉主編：《騰飛的澳門：回歸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09年，第397-398頁。
- <sup>8</sup> 黎熙元：《難以表述的身份——澳門人的文化認同》，載於《二十一世紀》，2005年12月號(總第92期)，第89頁。
- <sup>9</sup> Gordon Mathews：“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載於潘毅、余麗文編：《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1-72頁。
- <sup>10</sup> 何厚鏞：《2004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2003年11月19日。
- <sup>11</sup> 胡根：《博彩研究是澳門學的重要內容》，載於郝兩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635頁。
- <sup>12</sup> 王五一：《一錨六船》，載於《九鼎》，2017年第9期，第38頁。
- <sup>13</sup> 同上註。
- <sup>14</sup> 王宇：《歷史教育與文化認同——美國高校國家觀念教育的特色分析與借鑒》，載於《比較教育》，2007年第8期，第32頁。
- <sup>15</sup> 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第45頁。
- <sup>16</sup> 胡阿祥：《澳門學：一台多幕大戲》，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26日。
- <sup>17</sup>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3年第4期。
- <sup>18</sup> 同註4。
- <sup>19</sup> 楊允中：《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09年，第18頁。
- <sup>20</sup> 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
- <sup>21</sup> 吳志良：《尋找澳門文化的意義》，載於吳志良：《一個沒有悲情的城市》，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年，第105頁。

<sup>22</sup> 嚴昌洪、湯蕾：《國內外城市地方學研究綜述》，載於《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sup>23</sup> 同註1。

<sup>24</sup> 同註6。